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 廖莹

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迈入数字时代。数字协商民主作为一种顺应数字化时代发展的新型民主形式,将数字技术嵌入到基层协商民主中,极大地促进了基层协商民主的现代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在拓宽协商民主渠道、促进协商议题整合以及促使民主监督更为公开透明方面彰显出独特优势。

一、数字技术拓宽了基层协商民主参与渠道

数字技术能够拓宽和丰富基层公民参与民主协商的途径和渠道,从而提高公民参与的广泛性,推动公民有序参与政治。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基层工作离不开民众的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而将基层协商民主数字化有利于拓宽和丰富公众对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协商民主事务的渠道。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普及率已达到76.4%,截至2023年6月网民普及率达到10.79亿人。伴随着数字化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移动终端和互联网的普及,这些都为数字协商民主构建提供了基本条件。

首先,与传统的协商民主相比,数字协商民主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拓宽了民主参与的广泛性。在不需要到现场的情况下,通过视频会议、现场直播、语音电话等方式,突破了自然因素和非自然因素的制约与干扰,让民众能够更加便利地参与到政策的交流与探讨中。传统的协商民主要求有一定的空间和地点

来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投入,但数字协商民主只需借助互联网和数字设备就能实现,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支出,节约了协商成本,提高了工作质量与效率。其次,由于受身份、语言、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的制约,传统的协商民主不可能让所有的决策过程都能被公众广泛参与,因而很难达到“全覆盖”民主。但是,数字化的开放可以让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打破地理、身份和职业的限制,在基层治理中有序地参与,解决与基层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从而使凝聚共识的主体多元化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最后,公众不但可以打破时空的局限,展开全方位的交流,而且还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及时掌握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情况,对其进行多维度分析,及时反馈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相关的对策,从而提升政策的实施效率。

二、数字技术促进了基层协商议题资源整合

基层协商议题主要包括:城乡规划、征地拆迁、环境治理、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基层协商议题是整个协商过程的开始,影响着协商的方向和效果。随着数字化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数字平台来表达他们的需求。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在我国不同地方呈现出不同的创新路径,各地纷纷开展“政府留言”“网络问政”等实践,例如广西的“桂在协商”、江苏省的“有事好商量”、浙江省的“请你来协商”等,这些数字平台促进了公众表达自身诉求的信心和意愿,从而扩大了基层协商议题表达的基数。

一方面,数字化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优化基层政治协商议题的构建途径,减少信息收集的成本。传统的基层协商

和管理,确保网络空间的正确导向,增强网络空间成员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推动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第三,强化网络教育,提升全民网络素养。以人民为中心,加强网络安全和素养教育,使广大网民具备辨别虚假信息、抵制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能力。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的网络素养培训,提升公众的网络素养,使网络圈层成员能够在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中交流与互动,推动网络强国建设的深入发展。

二、话语入圈:创新意识传播话语融入圈层表达

网络圈层中的话语表达更偏向于风趣幽默,为了更好地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圈层中的影响以提升凝聚力,将“趣”注入严肃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之中,使主流意识形态更好地融入圈层。

其一,创新表达方式。深入网络圈层,与圈层主体进行对话,打破各圈层的封闭性,挖掘圈内常用的网络元素和用语,积极合理地运用网络热词和流行语来优化表达话语,培养新的兴趣生长点,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性。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不仅能够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圈层中的亲和力,还能促进圈层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文化融合,逐步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二,结合“硬认知”和“软表达”。主流媒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主体,具有严肃和专业的特性。然而,这种特性在面对网络圈层中的轻松诙谐氛围时,往往难以产生共鸣。为此,可以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专业知识通过表情包、短视频等新兴网络视听方式柔和地表达出来。这种亲和和表达方式不仅保留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专业

性,还能适应网络圈层化背景下的传播需求,使其更加易于被接受和传播。

三、队伍重塑: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队伍建设营造良好场域

意识形态工作队队伍可以说是处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线,他们肩负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斗争、多方位多角度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重任,一个高质量的意识形态工作队对于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团结、国家形象的树立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强化“专职”队伍的政治定力。专职队伍是指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包括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从事相关方向的研究人员和学者等。这些人大多在高校任职,是工作队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强化他们的政治定力和政治敏感度,让他们牢牢抓住主要面向互联网的“原住民”——作为“关键多数”的青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给予积极正面的影响以反馈在他们所在的圈层中去。

其二,提高“兼职”队伍的专业素养。兼职队伍主要是指网络圈层内的“意见领袖”,包括各大平台的“大V”“博主”、行业专家、名人和公众人物、商业领袖和企业家等。这些人大多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他们的专业素养水平各有差异,要根据他们所在的领域,强化专业知识的同时加强政治学习,培育出一批怀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定政治立场的“意见领袖”。

将“专职”和“兼职”结合起来,运用这两股力量塑造互联网的良好生态,打造积极向上的圈层场域。

四、制度束圆:健全网络监管制度合

人工智能等方式给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以最大限度发挥监督优势,提升监督效能,有力地促进了新型人民民主监督体系的建构。

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通过对数据的整合与综合分析,抛弃了人为操纵或对人主观判断,从而实现对信息资源更好地利用,使权力的运行轨迹更加公开透明,以增强监督效能。在当今智能时代,权力运行的每一环节和每一流程留下的痕迹都能以数据的方式保存在云端,用数据来记录和刻画权力运行的轨迹和公职人员的履职行为。比如,相关部门的单位政务、公共信息资源以及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资产流动以及项目立项等基本基本信息都可以通过数据的形式保存,还可以将其同步至相关平台和网站,迫使责、问责精准化、详细化。数据的“即时性”能够让人民群众全天候对被监督者的数据进行比较以及在事后精准权力问责,最大限度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优化传统监督路径,为新型人民民主监督体系打造行之有效的制度体制。传统的监督模式往往是重事后监督而轻事前、事中监督,这便会引发权力主体的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非公用现象。而数字化技术能够对传统的监督途径进行有效的整合与优化,将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达到对权力进行全方位、全覆盖的监督,防止错失最好的防控时机,全面提高监督的效率。通过数字赋能,可以全面、准确、实时地收集相关部门和公务人员的信息,并对权力运行留下的每一轨迹进行分析,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其变化,从而对其进行风险评价,从而有效地防止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出现的各个环节的风险。

【“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论内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孙馨月

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面临更新的教学任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学习与实践提供了指导,其中“六个必须坚持”不仅代表理论的创新,也是对教育实践的深刻指导。

一、“六个必须坚持”的科学内涵与生成逻辑研究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来源

“六个必须坚持”包括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这些原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在概念的界定上,每一个“必须坚持”都聚焦于特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旨在引导和激励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建设。

(二)“六个必须坚持”的历史演进与理论价值

“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形成与发展既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沃土,也紧密联系中国的实践经验。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到列宁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演进。尤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被引进,更通过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

二、“六个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的教学依据与路径

(一)教学依据

“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和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表现。将这些原则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六个必须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的总结与提升。这些原则中的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不仅各自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唯物史观的人民历史主体性、辩证唯物论的实践与创新思维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分析和全球视角,而且在综合上,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性和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

(二)教学路径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将“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需要创新教学设计,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系统地融入“六个必须坚持”,首先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可以进行调整,确保每个原则在相应的学习中都有其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实践指导。这种设计不仅强调理论的传授,还注重通过具体案例来深化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在“坚持守正创新”为例,这一原则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认识论章节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从实际出发,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这与“守正创新”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即在坚持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推动理论与时俱进,解决新时代的实际问题。

在讲解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时,教师应强调创新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讲解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三、“六个必须坚持”融入课程教学的具体内容研究

(一)内容的理论阐释

“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内涵。每一个“必须坚持”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创新。

“六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深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并针对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原则不仅简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而且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拓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所有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优先考虑人民利益,充分尊重和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同时强化党和党的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确保政策实施真正反映人民意愿和实际需求。

(二)教学内容的创新与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中,融入“六个必须坚持”的内容,需要不断创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增强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工具和方式,“坚持问题导向”的相关理论和实际案例,如企业管理、环境保护或社会治理中的问题解决方案。通过播放这些案例的视频,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问题导向在实际操作中的运用和效果。

在多媒体展示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每组选择一个实际问题,如环保或是科技创新等,讨论如何应用“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来分析和提出解决方案。

将“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不仅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也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以及未来方向与挑战的探索,高校可以不断完善和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课题名称:《马克思主义教育项目“六个必须坚持”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研究》(立项编号:E3E435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路径探析

■ 陆嘉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空间逐渐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交流的前沿阵地,分析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在“圈层化”影响下应对路径对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网络圈层化背景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显得尤为重要。网络圈层化使得不同群体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观形成各自的封闭圈层,这种现象不仅导致信息传播的同质化和极端化,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在各圈层中的传播面临挑战。为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举措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一、思想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理念引领圈层发展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一样,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强国建设理论。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网络强国战略思想融入网络圈层,形成“圈层合力”,引领圈层健康发展。通过关注不同网络圈层的需求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确保每个圈层的声音都能得到尊重和回应。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网络圈层的积极互动,还能增强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第二,毫不动摇坚持党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树立思想规矩,让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始终成为各网络圈层发展深化的核心引领。通过加强党的领导

和管理,确保网络空间的正确导向,增强网络空间成员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推动形成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第三,强化网络教育,提升全民网络素养。以人民为中心,加强网络安全和素养教育,使广大网民具备辨别虚假信息、抵制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能力。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的网络素养培训,提升公众的网络素养,使网络圈层成员能够在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中交流与互动,推动网络强国建设的深入发展。

二、话语入圈:创新意识传播话语融入圈层表达

网络圈层中的话语表达更偏向于风趣幽默,为了更好地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圈层中的影响以提升凝聚力,将“趣”注入严肃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之中,使主流意识形态更好地融入圈层。

其一,创新表达方式。深入网络圈层,与圈层主体进行对话,打破各圈层的封闭性,挖掘圈内常用的网络元素和用语,积极合理地运用网络热词和流行语来优化表达话语,培养新的兴趣生长点,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性。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不仅能够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圈层中的亲和力,还能促进圈层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文化融合,逐步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其二,结合“硬认知”和“软表达”。主流媒体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主体,具有严肃和专业的特性。然而,这种特性在面对网络圈层中的轻松诙谐氛围时,往往难以产生共鸣。为此,可以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专业知识通过表情包、短视频等新兴网络视听方式柔和地表达出来。这种亲和和表达方式不仅保留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专业

性,还能适应网络圈层化背景下的传播需求,使其更加易于被接受和传播。

三、队伍重塑: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队伍建设营造良好场域

意识形态工作队队伍可以说是处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线,他们肩负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非主流意识形态斗争、多方位多角度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重任,一个高质量的意识形态工作队对于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团结、国家形象的树立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强化“专职”队伍的政治定力。专职队伍是指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包括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从事相关方向的研究人员和学者等。这些人大多在高校任职,是工作队队伍中的“关键少数”,强化他们的政治定力和政治敏感度,让他们牢牢抓住主要面向互联网的“原住民”——作为“关键多数”的青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给予积极正面的影响以反馈在他们所在的圈层中去。

其二,提高“兼职”队伍的专业素养。兼职队伍主要是指网络圈层内的“意见领袖”,包括各大平台的“大V”“博主”、行业专家、名人和公众人物、商业领袖和企业家等。这些人大多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他们的专业素养水平各有差异,要根据他们所在的领域,强化专业知识的同时加强政治学习,培育出一批怀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定政治立场的“意见领袖”。

将“专职”和“兼职”结合起来,运用这两股力量塑造互联网的良好生态,打造积极向上的圈层场域。

四、制度束圆:健全网络监管制度合

理约束网络舆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圈层内舆论的同质化对于网络舆论的发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网络舆论失控而导致的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对网络舆论的监管力度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高要求。

首先,健全网络圈层管理制度。立法机关应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及时制定和完善网络社区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明确的网络圈层分类标准。针对不同圈层的网络圈层进行分类管理和指导,审查圈层内容,对于恶意剪辑、拼接、虚构的用户行为予以相应处罚。这不仅有助于维护网络空间的秩序和健康发展,还能够有效抑制不良信息的传播,保障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其次,创新网络舆论治理体系。动员多主体联合治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用户参与的综合治理机制,实现网络舆论的全方位、多层次管理。具体而言,应做到及时发现舆情、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对社会公开透明,打造具有高度公信力的政府形象。这一治理体系的创新,有助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使其在网络圈层中得到广泛认可和支撑,从而牢牢扎根于用户心中。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网络圈层化带来的挑战,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于文献计量视角的农业金融政策研究

■ 张莉 董亚

农业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产业,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道路上肩负重任,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农业金融政策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调控农业经济的宏观作用,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而服务。农业金融政策的制定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农村地区采取不同的金融政策,因地制宜,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农业金融政策会随着农村经济政策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我国主要的农业金融政策包括农村产业贷款政策,主要目标是扶持第一产业,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区域贷款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和重点区域产业区都有相应的贷款政策;农村贷款利率政策,实行差别利率,浮动利率以及优惠利率等。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以中国知网中文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词为“农业金融”,时间跨度为199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排除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纸等非期刊文献,排除英文期刊文献后,限制条件为“cssci”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检索到中文术期刊论文558篇作为有效样本文献,对我国农业金融政策的研究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理清农业金融政策发展变化的脉络,有助于推动我国农业金融政策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以期为我国农业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相关参考,推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一、文献特点分析

(一)发文量特征

发文量趋势变化可以反映该研究主题的研究热点变化趋势以及一定意义上的研究进展程度。我国农业金融政策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趋势变化。1994-2000年,平均年发文量维持在8篇左右,而在1997年发文量激增到20篇,结合现实背景来看,1997年我国农业生产经历了许多重要发展变革,农业金融政策方面更是涉及农村经济合作制改革,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政府推动农村信用合作制自主经营,激活农村金融市场。2001-2009年间发文量处于波动上升趋势,由15篇逐渐增加至31篇,这一期间,对于农业金融政策的研究处于持续关注

与不断探索的阶段。2010-2016年,发文量较为平稳,未有大波动,总体维持在30篇左右,特别是2016年发文量达到历史新高36篇,这与201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农业部印发《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背景相吻合。2016年后,相关领域的研究也持续推进,发文量呈现逐渐平稳的趋势,但总体来看,农业金融政策领域的研究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仍然较少。

(二)期刊与机构分布

在农业金融政策的相关文献期刊中,发文量前十的期刊分别为《中国农村金融》(25篇)、《武汉金融》(20篇)、《安徽农业科学》(11篇)、《商业经济研究》(9篇)、《浙江金融》(8篇)、《金融与经济》(7篇)、《上海金融》(4篇)、《金融发展与研究》(4篇)、《银行家》(4篇)、《中国财政》(3篇)。发文量前十的期刊都是经济类术期刊,其中《中国农村金融》与《武汉金融》以较大优势占据前两位。《中国农村金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中国金融出版社主办的金融财经类刊物,以宣传金融政策、分析金融运行、报道金融实践为主旨。《武汉金融》《浙江金融》《上海金融》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行主管的刊物,由此可见,农业金融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期刊来源是金融专业性刊物,次之是与农业或经济相关的刊物。发文量前十的机构分别为位于北京市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24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分行(9篇)、河北省的河北大学(8篇)、南京农业大学(8篇)、位于陕西省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7篇)、南开大学(7篇)、位于湖北省的中农农业大学(7篇)、中国人民大学(7篇)、辽宁大学(7篇)、处于四川省的西南财经大学(6篇)。发文量前十的机构中,3所为农业类高校,1所为财经类高校,2所为农业政策性银行,它们成为农业金融政策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从地区分布来看,其中北京市与湖北省分别占2席,也是该领域研究的主力所在区域,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发产出则较少,地区之间的研究产出差

异显著。

(三)核心作者分布

对558篇文献的作者进行统计,在农业金融政策研究领域发文量前三的作者分别是:南开大学的李金铮(5篇)、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的单一丽(5篇)、华北电力大学的张文祺(4篇)、中国人民大学马俊杰(3篇)、新疆农业大学的夏咏(3篇)、湖南工商大学的易棉阳(3篇)、山东经济学院的费振国(3篇)、南开大学的龚炎(3篇)、赣南师范大学的曾耀荣(3篇)、中国人民大学的丁振京(3篇)。其中南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各占2席,财经类高校有2所,整体来看,我国农业金融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之间合作较为分散,仍有较大合作空间。

二、研究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作者在写作论文时标引出来,能够反映文章核心内容,关键词词频分布的高低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代表该关键词研究热度越高,为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分析是指分析各关键词之间共同出现的频次来梳理关键词之间的关联程度。

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显示出现频率前十的关键词为:农村金融(34次)、农业金融(34次)、金融支持(24次)、农业(10次)、乡村振兴(9次)、现代农业(9次)、农业发展(7次)、启示(7次)、美国(5次)、农业贷款(4次)。出现频次最高的“农村金融”与“农业金融”存在较强的共现关系,可见农业金融发展的核心即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此外,“金融支持”与“农业金融”“农村金融”“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共现关系,可见,乡村振兴是目前农业金融发展的主要目标,金融支持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手段。“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之间也存在共现关系,可见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与乡村振兴息息相关,同样也离不开金融政策的大力支持,农业金融发展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二)关键词路径分析

关键词路径分析是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时间的路径分析明确该研究领域在不同时间点的关注热点,进而明晰该研究领域在研究阶段的研究热点转移以及进展程度。关键词反映该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或观点,随着研究的进展,关键词有所改变,代表研究者研究和关注内容发生转变。

在关键词路径中出现的前七个中心关键词为:“农村金融”“金融支持”“农业金融”“农业”“合作金融”“农贷”“风险管控”,这七个关键词是基于对关键词进行聚类,根据聚类下聚集的关键词数量进行排序得出。2000-2010年期间,“农村金融”“农业金融”“金融支持”“农业”“合作金库”是主要关键词,发表的相关期刊数量也比较多,在农村金融政策的前期研究阶段,金融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机构改革一直是研究重点,大量的文献着眼于相关金融机构在具体地区的改革措施与实施效果。其中“合作金库”即为金融机构,可见农业金融政策前期主要着眼于相关金融机构体系的变革发展,推行适宜的金融政策助力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直至2023年上述关键词仍然占据核心关键词前列。但另外也有新的关键词逐渐开始出现占据席位,“农贷”与“风险管控”在2010年后开始成为主要关键词,说明这一时期随着金融政策的变化,农业贷款的颁布实施成为焦点,研究的关注点从金融机构的改革转移到了农业贷款的发放及其带来的相关风险进行管理控制,“农贷”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风险管控”也应运而生,因此上述两个关键词出现的时间较为接近。

(三)关键词实现分析

关键词实现分析能分析短期内产生巨大变化的关键词,展示该关键词的起止年份和突变强度,可以从关键词的角度获悉过去和现在的研究热点。关键词不同阶段的更替迭代也展示了不同时间段的研究重点。

通过对CNKI的558篇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得到了13个突现关键词。

在13个突现词中,突现频次排名前三的突现词为:乡村振兴、农业金融、金融支持。在样本时间前期,突现关键词集中在金融支持、农业贷款、农业金融与农村金融等关键词中,这与农业金融政策的发展变化相吻合,农业金融体系与相关政策的改革一直是核心内容,因此研究的重心一直聚焦在农业贷款与金融支持上,持续关注金融机构与政策的改革实施效果。从2017年开始,突现词逐渐转变为“三农”融资模式、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三农”工作成为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也成为农业金融发展的核心。

由此可见,在对农村金融政策的研究中,研究热词由前期的“农村金融”逐渐更新迭代为“乡村振兴”,这表明随着政策的变化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完善,我国农业金融政策领域的研究重点也在不断地发生转移,同样表明对该领域的研究内容更加具体深入,研究方向也与我国政策方针步调一致。

三、结语

农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通过金融手段调控、调节农业经济活动的准则和方略,通过对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的调整而达到一定的农业发展目标。农业金融政策是我国经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业金融政策可以了解目前我国农业金融政策的研究重点和存在的问题,并与实践相结合,能更好地为农业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但是,目前关于农业金融政策的实施仍然较少,而对于如何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与农业金融政策相结合仍然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未来可以着力于对农业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例如,完善相关产权制度,放宽农村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农村保险事业等,或者结合相关国家有关新政策的内容,研究探索如何让上农业金融政策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持和保障。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项目编号:MLS202306)。(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在13个突现词中,突现频次排名前三的突现词为:乡村振兴、农业金融、金融支持。在样本时间前期,突现关键词集中在金融支持、农业贷款、农业金融与农村金融等关键词中,这与农业金融政策的发展变化相吻合,农业金融体系与相关政策的改革一直是核心内容,因此研究的重心一直聚焦在农业贷款与金融支持上,持续关注金融机构与政策的改革实施效果。从2017年开始,突现词逐渐转变为“三农”融资模式、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三农”工作成为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也成为农业金融发展的核心。

由此可见,在对农村金融政策的研究中,研究热词由前期的“农村金融”逐渐更新迭代为“乡村振兴”,这表明随着政策的变化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完善,我国农业金融政策领域的研究重点也在不断地发生转移,同样表明对该领域的研究内容更加具体深入,研究方向也与我国政策方针步调一致。

三、结语

农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农业金融的健康发展可以促进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国家通过金融手段调控、调节农业经济活动的准则和方略,通过对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的调整而达到一定的农业发展目标。农业金融政策是我国经济政策和信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业金融政策可以了解目前我国农业金融政策的研究重点和存在的问题,并与实践相结合,能更好地为农业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但是,目前关于农业金融政策的实施仍然较少,而对于如何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与农业金融政策相结合仍然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未来可以着力于对农业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例如,完善相关产权制度,放宽农村民间金融的市场准入,大力发展农村保险事业等,或者结合相关国家有关新政策的内容,研究探索如何让上农业金融政策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持和保障。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项目编号:MLS202306)。(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